

濒危语言保护与语言规划：以苏格兰盖尔语战略规划为例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郭书谏 沈 骑

摘要：濒危语言保护与规划是一个全球性语言问题，也是当今世界语言生活的重要课题。苏格兰盖尔语作为苏格兰地区的民族语言，近500年来使用人数逐步减少，并于20世纪末濒临灭绝。随着2005年《盖尔语法案》的通过，近年来苏格兰语言委员会全力推动各个公共部门采取一系列盖尔语复兴实践。本文基于Lo Bianco提出的语言政策分类框架，从地位、本体、习得、使用、声望五大领域评析盖尔语保护与发展规划的历史背景、战略举措与实施效果。借鉴和参考苏格兰盖尔语这一濒危语言保护规划的经验 and 做法，有助于提高国内濒危语言资源保护规划研究的国际视野和政策水平。

关键词：

1 引言

濒危语言保护和发展事关人类语言文化传承，是一个全球性的语言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扭转语言转用”和“代际语言破坏等级”（Fishman, 1991）的提出，语言濒危现象成为语言规划领域重点关注的议题。Ruiz（1984）提出的语言资源论，将语言多样性视为文化资源、智力资源、经济资源以及维护人权和公民权的资源，认为语言多样性加强了社会交流和联系，维护了文化多样性，具有多种意义上的建设性资源价值。在1992年举行的第15届世界语言学家大会上，“濒危语言问题”成为会议的两大主题之一。将语言视为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语言多样性对于保持本土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尊重并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逐步成为语言规划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种思潮。在这一背景下，“将语言视为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的重要资源，并作为文化生态和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科学的保护、继承、利用和传播”成为重要的政策实践（沈骑，2014）。

近年来，随着语言资源保护工作日益受到重视，国内学者加大对濒危语言保护与规划的研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濒危语言的社会语言学调查（孙宏开，2005）、录音存档（范俊军，2015）以及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曹志耘，2015）三个领域。以上研究大多基于人类学、社会学视角，其目的是为了挽救濒危方言的音系和语法等语言学特征以形成文献、录音资料。但是通过立法、行政等政策行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世界语言生活观测分析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9AYY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倡导濒危语言社会使用的语言规划尚未开展。如何以更广阔的视野对程度不同的濒危语言进行研究，是一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通过简要回顾濒危语言保护的相关研究，从五个领域评析近十五年来苏格兰盖尔语保护规划的经验与做法，分析这一规划的背景、举措和效果，总结并展望该规划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未来政策走向。

2 语言规划视域下的濒危语言保护

语言规划这一概念诞生于二战之后，早期从理论到方法旨在为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建立一套标准的现代语言体系，包括为本土语言创制文字、发展语法、编写词典，实现语言的标准化、现代化，以期为民族团结服务。然而这一愿景的实现经历了相当的困难。由于不当的语言规划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各民族围绕语言权利和本民族语言地位进行政策博弈。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政府在语言政策的执行中逐步寻求一种平衡：兼顾国家官方语言法定地位的同时，维护少数族裔的语言权利。不再以社会改造的视角将语言视为问题，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经济资源。

语言作为资源的观念促进了语言规划从理论到实践的逐步转型。1987年新西兰议会批准了旨在保护本土原住民语言的《毛利语法》(*Maori Language Act*)，1990年美国国会批准了旨在保护美洲印第安语言的《美洲原住民语言法》(*The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 Act*)。

澳洲学者 Lo Bianco (2010) 借鉴了 Haugen (1964) 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等概念，和早期语言规划学者不同，Lo Bianco 更加主张多语制，鼓励文化多样性，从语言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跨文化交际功能等方面论述了多语制的必要性。在政策实施方面，他将语言规划的政策目标划分为五大方面：语言地位规划、语言本体规划、语言习得规划、语言声望规划和语言使用规划。语言地位规划 (Status Planning) 指政府通过立法程序确定某语言在一国之中的法定地位。通常在一国宪法中都会规定其国语或官方语言，此外还包含对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认可条款。语言本体规划 (Corpus Planning) 指对语言自身要素 (如字、音、形、词汇、用法等) 的规划行为。语言习得规划 (Acquisition Planning) 又称语言教育规划，是结合语言习得 (包括一语习得和二语习得) 理论对语言教育制定规划，使之科学有效。此外，还有语言使用规划 (Use Planning) 和语言声望规划 (Prestige Planning)。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多语制对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从五大方面概述了多语制下的语言政策规划。这一理论将濒危语言保护的各种政策行为纳入了统一的分析框架。Lo Bianco 本人曾应邀为苏格兰语言委员会提供语言规划政策咨询服务，并提交了一份重要的语言政策规划建议书，其中对苏格兰盖尔语保护和规划提出战略建议。在过去的十五年中，苏格兰政府在盖尔语濒危

语言保护规划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3 苏格兰盖尔语的保护与规划

苏格兰盖尔语（下文简称盖尔语，通常盖尔语还可指爱尔兰盖尔语）属于凯尔特语族盖尔语支。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结束对英伦三岛统治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入侵英格兰并征服了凯尔特人，古英语逐步成为英格兰地区的通用语。在苏格兰地区，长期以来苏格兰盖尔语和古英语同时存在。盖尔语是聚居在苏格兰地区的高地苏格兰人的传统语言。1018年卢锡安（Lothians）省被苏格兰王国征服之后，盖尔语在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地位达到顶峰（Withers, 1984）。1707年《联合法》（*Act of Union*, 1707）生效，随着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合并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英语成为教育媒介语和政府语言，苏格兰盖尔语的使用人数逐年减少。1745年的詹姆斯起义（Jacobite Rising）失败后，英国政府实行高地大迁移（Highlands Clearances）政策，苏格兰地主被迫迁出高地地区，此举完全摧毁了盖尔语的生存基础（Murdoch, 1995）。据估计1755年时有23%的苏格兰人使用盖尔语，而到了1806年，这个数字下降至18%。1951年，仅存95,447人会使用盖尔语，占苏格兰人口的1.9%（见表1）。盖尔语的衰退一直持续到21世纪。2014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苏格兰拥有的139种家庭使用语言中，将盖尔语作为家庭语言者仅有497人，甚至比说汉语家庭人数（2,490人）还要少。

表1 苏格兰盖尔语使用者的历史人数变化（McLeod, 2004）

年份	苏格兰盖尔语使用者总数	占苏格兰总人口比例（单位%）
1500	150,000? ^①	50?
1755	290,000	22.9
1806	297,823	18.5
1891	254,415	6.3
1951	95,447	1.9
1981	79,397	1.6
1991	65,978	1.3
2001	586,52	1.2

① 表格中1500年的使用者总数数据和比例都带有“？”，表示此项数据并非统计结果，而是McLeod（2004）的推测，可能存在较多的不准确性。

盖尔语是苏格兰高地地区原住民凯尔特人的语言，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民族性，是苏格兰地区大多数人口的语言，有着丰富的口说与文学传统。不少历史文献和书籍都由盖尔语书写，举世闻名的苏格兰民谣由盖尔语传唱。尽管盖尔语的存续在过去两百年间受到了强势语言英语的不断挑战，但是它的保存和复兴对于苏格兰民族的身份认同十分重要。此外，作为少数凯尔特语族现存仍然被使用的语言，其存续记录了与英语差异化的语言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随着苏格兰议会于1997年重新获得立法权力，由工党领导的议会和议会第二大党苏格兰国家党在盖尔语问题上达成一致，希望通过立法以实现盖尔语的复兴和发展。苏格兰议会于2005年通过了《盖尔语法》(*Gaelic Language Act, 2005*)，自2006年开始生效。该项法律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成立苏格兰语言委员会(*Bòrdna Gàidhlig*)，该机构作为各项法案的主要执行者，其宗旨在于鼓励盖尔语的使用，有效增加盖尔语的使用者数量。第二，规定每隔五年苏格兰语言委员会须向苏格兰教育部提交国家盖尔语发展计划；建立各地区、各机构盖尔语发展计划的政策途径和实施框架；确立盖尔语教育的基本方针和目标。第三，根据这一计划要求，苏格兰地区的公共部门须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各自的盖尔语发展计划。

这一法案的通过扭转了盖尔语保护工作长期以来缺乏主管机构和经费支持的局面，确立了专项经费和主管机构，将盖尔语保护上升为政府行为。与民间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相比，可以更加有效地组织各方资源促进语言使用和复兴。

2005年法案实施之后，一系列具体政策得以出台，根据政策目标的不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双语制：盖尔语地位规划

英国成文法中没有规定英语是其官方语言，但在实践中作为官方语言使用。英国议会和政府文件都由英文书写，英国王室成员使用英语与公众交流。这一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地位在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和变化，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法语一度成为英国王室和上层社会用语(Crystal, 2004)。公元1362年《诉讼条例》(*Pleading in English Act*)法案规定法庭使用英语。在宗教领域拉丁语长期在教会中通用。经历了新教改革，亨利八世支持英文而不是拉丁文作为圣经统一版本的语言文字，直到1568年，具有新教色彩的英语版本的《圣经》得以出版并逐步成为通行版本(Greider, 2013)。自1707年《联合法》生效以来，英语既是大不列颠议会和政府的官方语言，又是苏格兰地区主要学校的教学媒介语。2005年的《盖尔语法》中提出“确保盖尔语成为苏格兰官方语言，获得与英语同样的地位”，从立法层面明确了盖尔语和英语共同作为苏格兰官方语言。

盖尔语官方语言地位的确立，是英国政府让渡部分权力进行属地管辖的结果。历史上苏格兰地区长期居住着高地苏格兰人(凯尔特民族)、低地苏格兰人(日耳

曼民族)和英格兰移民(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语言分别是分属凯尔特语族的盖尔语、日耳曼语族的低地苏格兰语和苏格兰英语。由于凯尔特民族既是苏格兰地区最早的原住民,又是历史上苏格兰民族构成的主体,尽管在大不列颠王国中处于少数民族地位,但保持着独特的民族认同感。采用双语制赋予盖尔语和英语相同的地位,既兼顾了苏格兰民族的语言权利,又承认了苏格兰作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一部分的政治现实。与《威尔士语法》(*Welsh Language Act*, 1993)相似,延续了语言政策在英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一致性。

双语制在苏格兰地区的确立另一方面受到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政治哲学的影响(Taylor, 1994),这一公共政策主张从20世纪60年代末被加拿大接纳,逐步扩散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政府支持和维护不同族群的各自特点。典型代表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司法上独具特色地采取大陆法系,语言上通行法语。英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逐步酝酿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为代表,被称为“詹金斯准则”。多元文化主义影响了许多后来的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Grillo, 2007)。在苏格兰地区,历史上凯尔特民族长期以来与英格兰主体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在语言、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之下,英国政府逐步让渡了部分权力,苏格兰议会能够决定当地社会的语言使用。

3.2 正字校音:盖尔语本体规划

Haugan(1983)将语言本体规划分为三大步骤:文字化、语法化和词汇化。盖尔语的本体规划活动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为口说语言确立文字系统是语言本体规划的重要步骤。1976年苏格兰教育考试委员会(SCEEB)在其盖尔语专家部门(Gaelic Panel)的要求之下,设立了一个研究盖尔语书写系统的子部门。在SCEEB的努力之下,1981年第一版的《盖尔语书写标准》(*Gaelic Orthographic Conventions*)得以出版,这一书写标准结束了盖尔语长期以来书写不规范不连贯的历史(Ross, 2016)。2005年苏格兰资格认证局(Scottish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决定对这一标准进行修订,在原有基础上拓展了2,000余个新词,包含拼读规则、发音规则(元音、辅音、重读、省略、变音)、动词、介词、标点符号、数字、日期、地名、人名、缩写和词汇表等部分。

早期进行盖尔语语法化研究成果包括*Elements of Gaelic*(Stewart, 1812)和*The Celtic Review*(Mackinnon, 1909)。随着*A Gaelic grammar*(Calder, 1923)以及*Gràmar na Gàidhlig*(Byrne, 2002)两本盖尔语语法著作的出版,盖尔语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语法规则体系。

词汇化的过程包括词典编纂出版和语料库建设。盖尔语的词典编纂活动自19世纪始,包括*Faclair gaidhlig*、*A Gaelic dictionary*等辞典都是早期的典型作品。2005年法案生效之后,盖尔语词典的电子化进程加快,出现了一批在线盖尔语词

典。语料库建设主要成果有两项：DASG 文本语料库（Digital Archive of Scottish Gaelic）和 Tobar an Dualchais / Kist o Riches 音频语料库。前者于 2008 年建立，包含 337 份文本，总计 1,900 万词。后者由爱丁堡大学负责建设，起步于 2005 年，包括总计超过 1,520 件数字化作品，约合 11,500 小时的录音。此外，微软公司不仅出版了盖尔语风格指南，也推出了针对盖尔语的拼写检查功能。

3.3 家庭课堂成人教育并举：盖尔语习得规划

盖尔语国家规划文件中将习得规划划分为早期家庭教育、学龄教育和学龄后教育。早期家庭教育的盖尔语规划以宣传自愿为主，政策目标围绕“增加家庭中盖尔语的习得人数”和“以盖尔语为媒介的早教人数”。学龄教育阶段划分了盖尔语为媒介的教学（GME）和盖尔语学习者教学（GLE），分别把盖尔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和外语进入课堂。学龄后教育针对成年人，以提高盖尔语使用者熟练度和盖尔语学习人数为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作为配套措施盖尔语课程的开发和师资培训逐渐展开。

Spolsky（2009）¹⁷认为“语言活力是语言生存的关键，只有当语言的自然代际传承起作用的时候，语言复活才会出现”，并把爱尔兰语复活运动的失败归因于自然代际传承的不成功，因为把“维持语言的重任推给了学校”。盖尔语习得规划似乎意识到这一点，学校虽然是教育的主要场所，然而由于语言习得的特殊性，家庭在第一语言习得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必须鼓励成人学习盖尔语，为家庭中的盖尔语习得创造条件，逐步恢复语言的自然代际传承。此外，在学校域的语言管理实践中，地区语言、国家通行语言和强势外语会形成竞争关系。法语作为苏格兰地区传统意义上的强势外语，英语作为国家通行语言和世界强势外语，从工具价值而言都胜过盖尔语。除了民族情感之外，如何说服教育管理者 and 家庭成员，在盖尔语学习上投入资源，恢复使用已经弃用多年的本民族语言，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

3.4 使用双语化：盖尔语使用规划

如何在双语制社会之中处理好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避免冲突，增进和谐，是语言使用规划的目标。实践层面而言，McRae（1975）区分了双语制中的属地原则（Territoriality principle）和属人原则（Personality principle）。在盖尔语的语言规划中两种原则兼而有之：在大不列颠王国层面，苏格兰地区实行双语制符合属地原则，即仅在苏格兰、威尔士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下放语言立法权，让地区人民自己决定语言政策。而在苏格兰地区，每个人可以任意选择盖尔语或者英语作为与官方交流的语言，符合属人原则。

从具体政策而言，国家盖尔语规划中明确了标识双语化政策。这一政策经由各个公共部门，如苏格兰警察局、苏格兰美术馆等等部门自行拟定的盖尔语规划，

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实施。具体而言，任何部门的标识、网站、文件和公共展示物，都将以盖尔语、英语两种语言共同呈现。例如，苏格兰警察局在原先英文版 Police Scotland 的涂装上，增加了 Poileas Alba 的盖尔语版本。

另一重要举措在于推动公共部门工作语言的双语使用，即无论政策咨询、展览导游、公共宣传等行为都由具备盖尔语英语双语能力的雇员进行。这一政策为苏格兰各个公共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各个部门自己的盖尔语计划中，都制定了人事、培训和公共服务各方面的具体方针。人事上优先雇佣具有盖尔语能力的人士；为现有员工建立盖尔语能力档案，培训语言能力；规定使用盖尔语举办讲座和活动的数量。

3.5 鼓励公众参与和支持：盖尔语声望规划

语言教育规划应该作为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成果，而声望规划是语言规划的动机要素（Baldauf, 2005）。简而言之，声望规划的目的在于推动公众认可盖尔语复兴运动的各项政策措施，并积极参与其中。

MacKinnon（2011）总结了迄今为止公众对盖尔语态度的三次调查，第一次于1980年由盖尔语社区（An Comunn Gaidhealach）开展，第二次于2003年由英国市场调研（Market Research UK）进行，第三次于2011年由TNS-BMRB负责。这三次公众调查构成了盖尔语态度和声望研究的基本依据。根据三次研究的对比发现，苏格兰人民对盖尔语的重要性认可度占据绝大多数。认为盖尔语对苏格兰人民十分重要的受访者不断增加，从1981年的41%上升到2003年的68%，直到2011年的78%。认为盖尔语对苏格兰国家具有重要性的受访者由1981年的70%，上升至2003年的87%和2011年的86%。认为在学校教育中增强盖尔语可及性十分重要的受访者由1981年的49%上升至2003年的66%，在2011年略有下降至63%。

公众对盖尔语重要度认可程度的增加和盖尔语声望规划实践密不可分。自2006年起发布的国家盖尔语规划文件论述了盖尔语对历史遗产、民族自我认同、文化多样性和双语教育等几方面的重要意义，并不断通过媒体、教育和宣传，不断巩固加强公众的认可度。早在Labov（1963）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中已经表明，语言声望和语言态度对于语言演变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濒危语言保护与发展仅靠专家学者和政府力量是不够的，通过声望规划改变大众对特定语言的态度、增加民意基础、认可语言复兴的重要性，是语言战略规划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

4 盖尔语保护与发展政策评价

4.1 盖尔语语言政策实施过程

自2005年《盖尔语法》出台迄今，十余年过去了，苏格兰语言委员会已经完

整制定并实施了两个国家盖尔语发展五年计划。包括议会、机场、大学等各个公共部门纷纷出台了结合自身的盖尔语发展计划。这些计划大部分按照苏格兰语言委员会提供的样板撰写，包含四个核心目标——认同感、交流、出版、人事，以及四大具体执行领域——语言习得、语言使用、语言地位和语言本体。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每一项措施的具体步骤、截止日期、负责单位或个人。

在盖尔语的复兴过程中，苏格兰语言委员会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机构，更多地发挥了指导、宣传、资金和人事支持的作用。它指导并批准各个公共部门制定自己的盖尔语发展计划，为盖尔语教育、双语化标识、盖尔语戏剧文学等方面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例如，盖尔语教育基金鼓励青年学生学习盖尔语，并在各个教育机构担任教职。盖尔语戏剧发展基金鼓励具有相应实力的团体创作盖尔语的话剧作品。

盖尔语国家发展计划主要包含各种鼓励盖尔语使用的政策，但不具有排他性和强制性，个人仍然具有选择哪种语言作为交际和教学媒介语的自由。近年来由于英语作为强势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通行，苏格兰教育越发“英语化”，外语教育的不足和传统语言的缺失，不利于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因此，苏格兰教育部门在近年来不断强调“1+2 语言战略”，即在基础教育阶段保证习得第一语言的前提下，在小学一年级引入一门外语教育，在小学高年级引入另一门外语教育，力求受过教育的苏格兰公民在通晓母语的前提下，掌握两门其他语言。

4.2 盖尔语语言政策成效显著

在盖尔语保护法案实施的十余年间，一系列盖尔语保护和复兴发展计划得以通过和实施。统计数据表明盖尔语使用人数的下降趋势大为减缓。2011 年数据显示，尽管盖尔语使用者从 59,000 人下降至 58,000 人，仅占苏格兰总人口的 1.2%，但相比前一统计周期 11% 的下降率，最近的统计周期仅下降了 1.2%，下降趋势大体得到控制。引人注目的是 20 岁以下的盖尔语使用者上升了 0.1% (McLeod, 2006)。

盖尔语习得规划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2009—2016 年，以盖尔语为媒介语的教育 (GME) 取得了一定增长，人数从 2,638 人增长到 3,892 人，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 50%；但是盖尔语学习者教育 (GLE) 近年来保持在 7,000 人的水平甚至略有下降。从绝对数量而言，盖尔语教育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GLE 和 GME 的总人数仅占学生总数的 1.6%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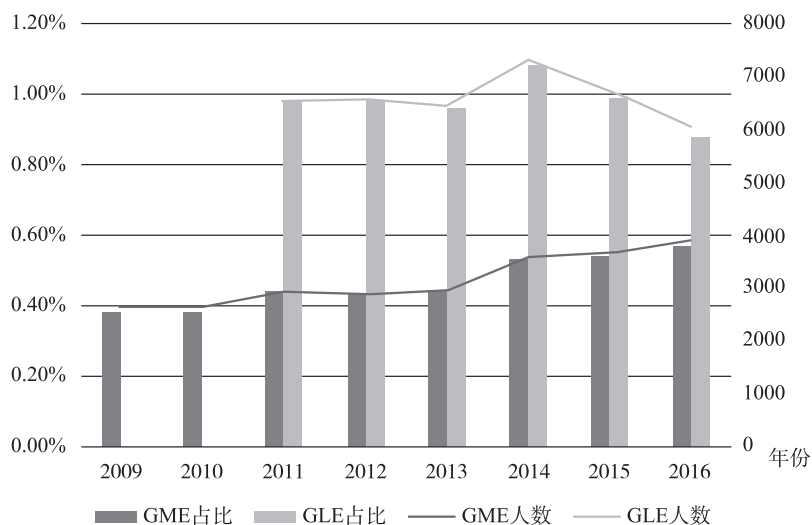


图 1 2009—2016 年 GME 和 GLE 的学生及占比统计 (Gov.scot, 2017)

近些年盖尔语本体规划的主要成果集中在电子化方面，语料库、在线词典、拼写检查软件等相继建设，2016 年盖尔语成为最新收录至 Google 翻译的语言，这一系列举措为盖尔语的互联网使用提供了基础。此外，使用规划措施初见成效，公共场所的标识盖尔语已随处可见，苏格兰美术馆、警察局等主要社会服务机构已提供盖尔语服务，双语版本的网站逐步面向公众开放。

4.3 未来政策展望

过去十余年的语言复兴政策虽然遏止了盖尔语在苏格兰的持续下降趋势，挽救其濒危处境，但距离 2005 年法案中盖尔语作为苏格兰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还相去甚远。相比英语接近 100% 的使用人口覆盖，盖尔语目前 1.2% 的人口覆盖率和 1.6% 的教育覆盖率仍然显得非常弱势。希伯来语的复兴从 1879 年埃里泽·本·耶胡达提出到 1998 年已达到 500 万使用者，历时百年之久。未来如果苏格兰的 500 多万人口都成为盖尔语使用者，恐怕也将持续百年。

决定未来盖尔语政策是否会像希伯来语一样成功，主要取决于多元文化主义和集中主义在英国的政策平衡。盖尔语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苏格兰民族党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同样也是 2014 年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主要倡导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盖尔语的复兴政策不单纯具有语言意义，更包含了民族独立和身份认同的主张。这一点在希伯来语复兴与犹太复国运动的密切关系中已成为历史佐证。2011 年卡梅伦在演讲中已经批评过多元文化主义，未来趋同的集中主义若在政坛占据上风，盖尔语的复兴之途恐将十分漫长。

5 借鉴与启示

通过语言规划理论分析苏格兰盖尔语复兴实践可以发现,濒危语言保护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录音录像,更需要战略规划指引和立法的支持。在语言本体、语言习得、语言声望等各个层面制定相关规划,采取行之有效措施力求将语言作为重要文化资源和民族情怀载体,使其得到应有保护。

苏格兰盖尔语的复兴政策为濒危语言保护政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和路线图。通过地方立法程序赋予濒危语言相应的法定地位;通过编纂词典、语料库和电子化程序实现语言的现代化和标准化;面向全年龄段因地制宜确立教育目标,恢复代际语言自然传承;鼓励公民在语言生活中能够平等地使用濒危语言和强势语言;根据现有统计了解语言声望并制定措施宣传濒危语言,为其存续创造良好的舆论声望。以上措施构成有机整体,其政策关键在于通过建构盖尔语在当代的工具效用,鼓励公民作为主体参与到濒危语言复兴当中来,从而为盖尔语的社会使用创造有利条件,最终实现代际语言的自然传承。民族语言的保护不仅是保存在博物馆中的“文物”,语言最终也需要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功能和使用场景才能维持延续。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2015.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定位、目标与任务 [J]. 语言文字应用 (4): 10-17.
- 范俊军, 2015.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四论——关于语料采录和加工、技术培训等问题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 78-82.
- 沈骑, 夏天, 2014. 论语言战略与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04): 112-118.
- 孙宏开, 2005. 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J]. 语言文字应用 (1): 13-17.
- BALDAUF R B, KAPLAN JR R B, 2005. Language-in-education policy and planning [M]// Hinkel, E.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Lawrence Erlbaum, New Jersey.
- BYRNE M, 2002. Gràmar na Gàidhlig [M]. Stòrlann-Acair.
- CALDER G, 1923. A gaelic grammar: containing parts of speech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phonology and etymology with a chapter on proper and place names [M]. Colton Book Imports.
- CRYSTAL D, 2004.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Ernst Klett Sprachen.
- DUNBAR R, 2005. The gaelic language (scotland) act 2005 [J]. Edinburgh law review, 9: 466-479.
- FISHMAN J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Gaidhlig.scot. Funding schemes – bòrd na Gàidhlig [EB/OL]. (2017-07-12) [2020-04-27]. <http://www.gaidhlig.scot/bord/fundraising/>.
- Gov.scot. School estate statistics [EB/OL]. [2020-04-27]. <http://www.gov.scot/Topics/Statistics/Browse/School-Education/schoolestatestats>.

- GREIDER J C, 2013. The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s and history [M]. Bloomington: Xlibris Corporation.
- GRILLO R, 2007. An excess of alterity? Debating difference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0: 979-998.
- HAUGEN E, 1964.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lanning [C]// *Proceedings of the socio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UCLA sociolinguistics conference*.
- HAUGEN E, 1983.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us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Cobarrubias J. and Fishman J. (eds.). *Progress in language plann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31: 269-290.
- LABOV W, 1963.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 [J]. *Word*, 19: 273-309.
- LO BIANCO J, 2010.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policies and multilingualism for cultural diversity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61: 37-67.
- MACKINNON D, 1909. On the orthography of scottish gaelic [J]. *Celtic review*, 6: 1-17.
- MACKINNON K, 2011. Public attitudes to gaelic: a comparison of surveys undertaken in 1981, 2003 and 2011 [M]. *Bòrd na Gàidhlig*.
- MCLEOD W, 2004. *Divided gaelic: gaelic cultural identities in scotland and ireland, c. 1200-c. 1650*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LEOD W, 2006. Gaelic in contemporary scotland: contradiction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J]. *Anuari: revista de recerca humanística i científica* 17 [Europa parla (II): lengües no romàniques minoritzades d'Europa], 83-98.
- MCRAE K D, 1975. The principle of territoria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personality in multilingual stat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33-54.
- MURDOCH S, 1995. *Language politics in Scotland* [R]. Aberdeen: AUSLQ.
- ROSS S, 2016. *The standardisation of scottish gaelic orthography 1750-2007: a corpus approach*. Thesis [M]. University of Glasgow.
- RUIZ R, 1984.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J]. *NABE journal*, 8: 15-34.
-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WART A, 1812. *Elements of gaelic grammar: in four parts* [M]. C. Stewart, sold by Oliphant, Waugh, & Innes.
- TAYLOR C, 1994. *Multiculturalism*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THERS CW, 1984. *Gaelic in scotland, 1698-1981: 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a language* [M]. John Donald.

作者简介：郭书谏，博士，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政策与规划。电子邮箱：guoshujian@tongji.edu.cn。

沈骑，博士，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政策与规划。电子邮箱：qishen@tongji.edu.cn。

（责任编辑：张虹）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in This Issue

Applying “variety consistency” and “communicative responsiveness” in teaching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n China: A conceptual framework

XU Hao

Based on a critique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th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it carries, this article sets forth a principle that applies variety consistency and communicative responsiveness in teaching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n China. To achieve variety consistency, learners should, in all stages of learning including advanced ones, be exposed to only one variety of English as a main source of input, conceptualised as a referred variety, other less contacted varieties as referring varieties. To acquire communicative responsiveness, learners need to be thus trained as to be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others' diverse communication needs, of employ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flexibly in response to varying situations, and of identifying new linguistic and pragmatic patterns while in contact with referring varieties of English.

A study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apital

AN Fengcun; ZHAO Lei

Languages are essential tools for human beings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other and to understand and change the worl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language has been being an important cultural morphology. Meanwhile, languag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and the community determines their social status. The enhancement of language ability relies on the investment in language education. Against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economy and the cultural diversity, the multi-property of language valu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reflects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s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capital.

A case study of strategic planning: The gaelic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GUO Shujian; SHEN Qi

The planning and revitaliz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is a major topic worldwide. As the native language of Scotland, Gaelic was spoken by fewer and fewer people in the recent 500 years and close to extinc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With the *Gaelic Language Act* passed in 2005, a number of actions aiming at Gaelic revitalization have been carried out by Bòrd na Gàidhlig. 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Lo Bianco's theory framework, the history, strategic actions and outcome are analyzed from five

perspectives: status, corpus, acquisition, use and prestige planning. The experience learnt from these practices will benefit our research in language protection and planning.

A survey and comparison of English learning attitude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NeiGaoBan”

KADILIYA; WANG Wenbin

B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Beijing “NeiGaoBa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learning among Han Kao Han, Min Kao Han and bilingual learners, and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distinguishes th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the First Acquired Language” and “the First Learned Language” for the first time. It reveals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 learning backgrounds of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Xinjiang and corrects the misconception that “ethnic minority English learners are trilingual learners”.

Research progress, hot topics and the latest trends in language contact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GAO Yujuan; LI Baogui; LI Hui

Based on the CNKI, a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about the literature on language contact from 1978 to 2018 using the bibliometrics method.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amount of language contact is exponentially increas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were mainly published in the nine core journals such as *National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and *Journal of 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major contributors ar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unded research papers are relatively few and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is research field. Moreover, more competent researchers must be trained to engage in this field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It is also found that hot topics of research includ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language contact, the contact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language evolution”, “language variation”,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European phenomenon” and so on.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dialects, it mainly involves such aspects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ighur” and “Zhuang language”. The latest frontiers are researches on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code-switching, loanwords, and language harmony.

A study on the concep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by non-Chinese mandarin learners in Malaysia

ZHAO Yafei; WANG Zulei

The number of non-Chinese Mandarin learners in Malaysia is increasing. By a